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党课参考材料

中共沈阳市委 宣传部 组织部 编
党 校

沈 阳 出 版 社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课参考材料

中共沈阳市委
宣传部
组织部
党校 编

沈 阳 出 版 社

1990年·沈阳

责任编辑：田雪峰

封面设计：张君华

责任校对：文捷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课参考材料

中共沈阳市委 宣传部
 组织部 编
 党 校

沈 阳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沈阳市和平区十三纬路2段19号)

沈阳日报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字数 110千字

印张 5.125

印数 1—25000

1990年1月第1版

1990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80556-389-6/D.36 定价：1.70

编者的话

为了认真吸取今年春夏之交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经验教训，突出地对广大党员进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教育，以全面地理解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共沈阳市委宣传部、组织部、市委党校联合编写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课参考材料》一书，可供基层党组织和基层党校对党员进行教育时参考。

本书共九讲，依次由刘盛德、施善元、王秀兰、贾海楼、刘功力、侯述佳、佟辑云、袁家刚、王贵文等同志编写。省委党校曹洪家、胡淑英，市委组织部孙猛、市委党校哲学教研室李寄秦及部分基层单位宣传部长对编写提纲提出了宝贵意见。市委党校刘盛德、霍宗孟等同志协助修改了部分书稿，在此一并表示感谢。全书由市委宣传部王毓文、佟辑云、王秀兰、袁家刚统改。丁世发、李成顺、赵联群同志审阅了书稿。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当之处，敬请各位读者批评指正。

一九八九年十月

目 录

第一讲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
第二讲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	(22)
第三讲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	(40)
第四讲	坚持人民民主专政·····	(58)
第五讲	坚持共产党的领导·····	(79)
第六讲	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101)
第七讲	继承和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	(119)
第八讲	严格遵守党的纪律·····	(133)
第九讲	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	(147)

第一讲 必须旗帜鲜明地反 对资产阶级自由化

1989年春夏之交，在我国发生了历时两个多月的由学潮到动乱，由动乱到反革命暴乱的严重事件。我们的共和国又经历一次惊心动魄的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政治斗争。我们党领导人民制止了动乱，平息了反革命暴乱，取得了捍卫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共和国的伟大胜利。风雨过后，全党和全国人民需要“冷静地考虑一下过去，也考虑一下未来”，需要广泛开展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教育，以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的必要性、长期性的认识。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实质、表现及其危害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这句话概括说明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本质。邓小平同志不只一次地指出：“中国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出现一种思潮，叫资产阶级自由化，崇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1985年5月）“这种自由化实际上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

主义道路。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1986年9月）“所谓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要中国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1987年3月）——这些论述深刻地揭示了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第一，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主张资本主义制度；第二，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目的是要打倒共产党，取消人民民主专政，主张建立一个完全西方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以崇拜西方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主张“全盘西化”，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为特征的一股政治逆流。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走资本主义道路，是违背全党和全国人民愿望和利益的。理所当然受到全国人民的反对。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表现

今年发生在首都北京并波及全国的动乱和暴乱，是多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结果。也是极少数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人制造舆论，鼓吹“全盘西化”，散布大量攻击四项基本原则的思想理论观点的一次大曝光。所以邓小平同志说，“这次事件的性质，就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四个坚持的对立。”（《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的讲话》，1989年6月）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主要表现是：

1. 散布社会主义道路“失败论”，主张“公有制财产私有化”，企图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各族人民从切身体验中得出不可动摇的结论是：社会主义好。只有

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而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方励之却说：“社会主义不管具有‘中国特色’还是不具有‘中国特色’，都根本没有用，而且不可能起作用”。“政府应当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鼓励私人所有制。”当有人问到中国的出路是什么时，方回答是“资本主义化”。在动乱中出笼的一篇《中国的希望——私有制宣言》，竟然攻击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制度“束缚生产力发展”，是“产生官僚主义的土壤”，是“贪污腐化的温床”，公然说公有制是一切的“祸根”，“要早日敲响公有制的丧钟，去迎接共和国新的明天”。极少数人不顾我国建国四十年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取得巨大成就的事实，把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诬蔑成“漆黑一团”。公开宣称“社会主义的尝试和失败是二十世纪的一大遗产”。方励之在台湾《联合报》上发表《中国的失望和希望》一文说，今年是建国四十周年和“五四”七十周年，“正好象征着中国的失望和希望”，“四十年的失望，根源在四十年的社会制度本身”。他提出要通过多种形式形成反对政府的“压力集团”，“对当局采取公开的批判”。那位从美国匆匆赶回北京参加动乱谋划的刘晓波声言：“香港一百年殖民地变成今天这样，中国那样大，当然需要三百年殖民……”。“三百年殖民地”就是他们所谓的“希望”和“明天”。这种自我暴露，预示着一旦他们阴谋得逞后的政治趋向。

最近邓小平同志在一次重要讲话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即殖民地——笔者注）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

也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的启示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的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中国的希望和前途在哪里？总结我国的历史和四十年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以及从这次暴乱得到的重要启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2. 攻击人民民主专政，宣扬资产阶级“民主”、“自由”，主张取消“阶级专政”搞无政府主义。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即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它实现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求消灭一切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在资本主义国家，即使在民主制度“最完善”的美国，也是资产阶级当家做主，维护剥削制度。正是从这个意义上，列宁说，无产阶级的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的民主要民主百万倍。

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把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吹上了天，而对我国的人民民主专政则极尽污蔑之能事。方励之曾说，“中国目前没有民主，连民主的ABC也没有。所以，中国目前应向民主迈出第一步。”今年三月，北京的几所大学同时出现的《讨邓檄文、告全民书》的大字报，胡说什么，“共产党的政治就是空谈、强权、独裁、武断”。某大学还贴出题为《为中国人悲哀》的小字报，叫喊打倒“专制”和“独裁”。同月，在北京一些院校出现的《致广大青年学生的一封信》中，就鼓动“在爱国主义民主战士方励之的领导下，参加到民主、自由、人权的激流中去。”为此，一些动乱的组织者和策划者，竟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天安门广场树起美国式的

所谓“民主女神”，办起短命的所谓“民主大学”，建起肮脏不堪的所谓“自由村”。就是在这种“民主”、“自由”的鼓噪下，“不要政党、不要权力，一切人和公民绝对自由”，否定国家政权的无政府主义大肆泛滥，以致由学潮发展到动乱，由动乱发展到北京的反革命暴乱。涉及面之广，骚扰之严重，是建国以来没有过的。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所以，一定要认清民主、自由、专政问题的实质，分清是非。列宁早就指出过：“超阶级的一般民主，‘纯粹民主’是自由主义者用来愚弄工人的谎话。”（《列宁选集》第三卷，第629页）

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由中国的国情决定，我们不能照搬任何国家的民主模式。邓小平同志于1989年2月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指出：“中国处于发展经济的进程中，如追求形式上的民主，结果是既实现不了民主，经济也得不到发展，只会出现国家混乱、人心涣散的局面。我们对此有深刻的认识，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经历，亲眼看到它的恶果”。

3. 反对党的领导，鼓吹“取消共产党，实行多党制”，主张照搬资产阶级议会制。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已经是我国人民老幼皆知、家喻户晓的道理。在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搞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必然要四分五裂，一事无成。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核心则是反对共产党的领导。方励之说：“党已经变质了。党的领导已经成为一种宗教。如果中共衰落而同时私人经济变为优势，如果中共失去了政治和经济的权力及人民的信任，其唯一的出

路是让别的组织上台。现在中共已经无力控制一切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攻击党的领导险恶用心，在这次反革命暴乱中，完全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北京某些院校的大小字报中，有的攻击共产党是“一代奸雄”，是个“即将毁灭的组织”，要求“消灭共产党，实行多党制”，“取消各团体、学校、单位的党支部和教工干部”，打倒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邀请国民党回大陆，建立两党政治，杀死四千七百万共产党党徒”的口号甚嚣尘上。这一切再一次说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实质，就是要否定和取消党的领导。

当今中国究竟有哪一种政治力量能够承担得起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大业？没有。只有中国共产党有这样的领导资格，有这样的人民基础，有这样的凝聚力。

4. 用“过时论”、“僵化论”等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作用，主张“真理多元论”，为西方资产阶级各种理论观点取代马克思主义鸣锣开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指导思想。同我国的革命时期一样，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丝毫不能动摇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原则。可是顽固推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却对它进行大肆的攻击和诬蔑。方励之说：“马克思主义没有多大用处了，这是不容争辩的真理”。“马克思主义三个部分均已过时，而且错误。”“马克思主义是一种过去的东西。……它象一件穿旧的衣服一样，必须把它脱下”。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还攻击马克思主义是“封闭的”、“狭隘的”、“排他

的”、“僵化的”、“丑陋的”，要“把马克思主义理论赶出中国思想理论舞台”，提出要反对“唯马是举的中国式的思考模式”。这一系列的喧嚣，无非是蓄意诋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然而，马克思主义没有也不可能“过时”、“僵化”。马克思主义在实践中，马克思主义在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仍然是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是指引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的旗帜。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糟蹋马克思主义的妄想注定会失败的。

（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危害

我们可以从今年发生在全国许多大城市的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中，看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造成的危害是多么深重。

第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腐蚀了部分党员、干部、群众，特别是青年学生的思想。近几年来，由于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缺乏一贯性，再加上党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薄弱，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乘机泛滥，把一些人特别是一些年轻人的思想搞得相当混乱。况且，许多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论，还披着“改革”和“民主”的外衣，具有很大的欺骗性。使一些人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界限淡化了，逐渐看不惯、看不起“生我养我”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往资本主义社会。有人甚至说什么“宁做资本主义的奴隶，也不做社会主义的主人”。还有些人信奉“抬头向前看，低头向钱看，只有向钱看，才能向前看”的教义，开始追求“自我设计”、“自我发展”、“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动摇了他们应该具有的马克思

主义世界观的基础。以致于在动乱中一批大学生和群众甚至少数党员被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所鼓动，有的绝食，甚而被当作人质，为极少数坏人操纵和利用。可见，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所造成的“灾情”是多么深重！

第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泛滥，妨碍了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我们的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我们的开放是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对社会主义建设有益的东西，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一个补充。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则打着“改革”、“开放”的旗号，主张“全盘西化”，企图把中国变为资本主义的附庸国。邓小平同志不只一次地严正指出，搞四个现代化，实行开放政策，不能搞资产阶级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发展，我们的事业就会被冲乱。因为“这股思潮的代表人物是要把我们引导到走资本主义方向上去。所以我多次解释，我们搞的四个现代化有个名字，就是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

事实证明，近年来由于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不仅使一些人的思想混乱，而且也使社会生活中出现一些不利于改革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发展的混乱现象。如，“一切向钱看”、“大公有私”论的泛滥，诱发并助长了投机倒把、倒买倒卖、贪污受贿、敲诈勒索等各种腐败现象，各种各样的蛀虫，都争相吞食着国家的资财，严重败坏了改革、开放的声誉，影响了现代化的进程。此外，在这次动乱到反革命暴乱期间，给国家造成的损失不下百亿元人民币。这对于我们这个经济建设资金短缺的国家，其影响之巨可想而知。

第三，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是这次动乱和反革命暴乱的制造源，严重危害了国家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几十年的经验和教训告诉我们，政治上的安定团结，是经济稳定发展的根本保证。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不可能安下心来搞建设。所以，全党、全国人民十分珍惜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那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的代表人物，却企图制造动乱搞乱民心，乘机夺权。早在1986年，方励之就鼓动人们对党和政府“捅一捅”、“动作动作”。1987年以后不断鼓动“用一些激烈的方式夺取民主”。今年4月20日学潮开始不久，方励之在接受香港记者电话采访时讲，“中共若不与学生坦诚对话，那么形势就不容乐观，甚至会演变成为动乱”。金观涛（《走向未来丛书》副主编）大叫“中国大乱之至，中国危亡之日。诸位拭目以待之”。这些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为什么那么热衷动乱？这是同他们所要达到的政治目的攸关。请看，在今年学潮中，每当政府采取措施缓和学潮，学生的情绪趋于平静时，总会有人造谣惑众，进行新的煽动，刺激学潮升温。5月以来在首都北京游行的规模越来越大，由几万人发展到几十万、上百万人，使北京市的生产、工作、社会秩序受到严重干扰和破坏。有的围堵、冲击党中央、国务院的办公机关和中央领导同志的住所。一些流氓分子深夜窜到市委、市政府门口用极下流的语言谩骂、滋扰。城区公共交通秩序受到很大破坏，一度陷于瘫痪。工厂的原材料不能及时运进，产品不能及时运出，煤气罐、蔬菜、粮食等运输都受到阻拦。更为严重的是北京的事态波及全国，使不少城市出现了混乱局面。大有

“文化大革命”时期大串联的那股子劲头。这是一种怎样的景象？任其发展又将会怎样？这个答案是不出自明的。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严重泛滥导致的动乱和北京的反革命暴乱，又一次触发人们深思既往。动乱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在我国人民心底深处打上的烙印实在太深刻了。动乱不得人心。顽固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代表人物，想要把中国再次拖进那个人人深恶痛绝的境地，是违背广大人民意愿的，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反对。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产生和发展的原因

（一）资产阶级自由化在我国产生和发展

我国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是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后不久。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逆流在我国的发展，大致经历三个高潮，第一次是1979年的所谓“北京之春”运动。当时我们党正在领导拨乱反正。一些人借解放思想，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利用我们党在“文革”中的挫折，利用林彪、“四人帮”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社会问题，同港台及国外政治势力相勾结，采用“文化大革命”中的“大民主”方式煽动闹事，矛头直指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攻击说：“万恶之源是无产阶级专政”。

“要坚决彻底批判共产党”。鼓吹什么“中国现在不是搞四个现代化的问题，而是应该搞资本主义式的社会改革”。当时，邓小平同志对他们的言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提出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指出，

“今天必须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为某些人（哪怕只是极少数人）企图动摇这些基本原则。这是决不允许的。每个共产党员，更不必说每个党的思想理论工作者，

决不允许在这个根本立场上有丝毫动摇。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坚持四项基本原则》，1979年3月）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逆流的第一个高潮就是这样被击退了。

第二次是1986年至1987年春，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推出方励之、王若望、刘宾雁等头面人物，到处讲演游说，散布大量资产阶级自由化观点。公开提出反对共产党的领导，要“改变党的颜色”。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认为社会主义是“历史的畸型”，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主张“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说什么“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这恰恰是我们需要的，紧迫的需要。这一步我们一定要走的。”这一次还是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地坚决反对，才使这股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逆流被击退。1986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届六中全会上的讲话》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为什么？第一，现在在群众中，在年轻人中，有一种思潮，这种思潮就是自由化。第二，还有在那里敲边鼓的，如一些香港的议论，台湾的议论，都是反对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主张我们把资本主义一套制度都拿过来，似乎这样才算真正搞现代化了。”同时还强调，我们决不允许资产阶级自由化冲击我们的四化建设大业。

第三次便是从1988年5月由方励之、李淑贤夫妇一手策划，在北京大学成立所谓“民主沙龙”开始的。他们提出要接受历次“民主运动”的教训，“一定有组织、有计划、有纲领地进行”，“要广泛获得国际社会的同情和支

持”，“要发动社会各界形成对政府的集团压力”，“要干到底，决不半途而废”。所以，1989年的学潮一开始，就是在这极少数人的操纵下，有组织有预谋地向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发展。

（二）资产阶级自由化产生的原因

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我国泛滥的原因在哪里？这次平息反革命暴乱后，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1989年6月）

首先，自从地球上产生了社会主义国家，就存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斗争。这种斗争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并且还将持久地进行下去。历史和现实的大量事实表明，国际资产阶级从来没有放弃过颠覆、消灭社会主义的根本战略。他们总是企图使各社会主义国家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纳入资本主义轨道。为此，他们曾经用过“政治孤立”、“经济封锁”、“策反颠覆”、“武装干涉”、直到发动侵略战争等种种手段。当这些都未能得逞宣告失败之后，又变换新的手法——“和平演变”战略。把希望寄托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力量的身上。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诞生的前夕，1949年8月5日美国国务院就发表了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它一方面哀鸣美国对中国政策的失败和破产，另一方面又俨然以主宰者的面孔，念念不忘东山再起，卷土重来。四十年来，美国对中国的具体政策有一些变化，但是对于要